

儒家伦理视域下当代医学职业伦理观之重构

周志新, 杨同卫, 陈晓阳

(山东大学 人文医学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012)

摘 要:在医学职业的发展过程中,医学职业伦理观不断转变,随着当代医学中技术至上思想和唯科学主义的出现,重构当代医学职业伦理观意义凸显。儒家伦理是阐释、指引当代医学职业伦理观重构的理论资源。当代医学职业伦理观重构的主要内容包括:树立“仁爱爱人”之本源观,坚持“见利思义”之价值观,塑造“内省慎独”之医德观,追求“博及医源”之医道观。

关键词:儒家伦理;医学职业伦理;重构

中图分类号:B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4)01-0042-05

作者简介:周志新(1979—),男,河南信阳人,山东大学人文医学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从事医学伦理及医学人文研究;陈晓阳(1955—),男,安徽宿州人,山东大学人文医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医学伦理学研究。

随着医学职业化的不断发展、医学建制的确立及其社会价值取向的嬗变,当今医学职业界正经历着复杂的文化、道德、经济转变,道德真空事件屡屡出现。因此,在继承传统医学道德的基础上,应重视重构与当代医学职业特征、职业环境相适应的普适性的职业伦理观。在我国悠久历史的文化长河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伦理以其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为价值目标体系而深得人心,在许多方面与医学职业实践接轨,其“仁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人合一”等宝贵思想资源为医学职业伦理观的构建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一、医学职业化及医学职业伦理观

中国古代“职”意为分内应执掌之事,即职业。中国古代有“百业”之谓,存在着繁杂的职业分类,不仅有“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书·周官》)之记载,亦有“以九职任万民”(《周礼·大宰》)之论断。在现实社会中,正是分工的专业化发展促进了职业的日益

分化,造就了职业的专门化。职业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所在和现代社会突出存在的现象,在此基础上,职业伦理得以孕育与培植。职业伦理是对从事某种职业的群体或个人的总体性价值要求,是对具有总体性的社会伦理和社会主导价值观的遵循。作为一种特殊的伦理立法,职业伦理主要从社会伦理的角度确立该职业的伦理规范及价值观,着力解决该职业领域内的伦理失范和价值混乱问题。职业伦理区别于职业道德,它虽包含着职业道德,又不归结于职业道德,与职业道德互相联结,且互相转化。职业道德是针对某一职业从业者个体的特殊要求,职业伦理则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提出要求,既扬弃了抽象法权的直接客观性,亦扬弃了道德的直接主观性,实现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1]。职业伦理把从业者定位为按照既定职业来加以区分的特定社会角色,依此规定其权利与义务,因此是一种角色伦理。职业伦理的主要任务是确定职业主体的伦理规范及价值

收稿日期:2013-11-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10AGL012)

观,为其提供社会伦理立法,把外在的社会伦理内化为从业者个人的道德体认,使其恪守职业行为的伦理规范和准则。由此,职业伦理观是职业主体对职业伦理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职业主体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与古希腊医学一样,随着医学职业化的不断发展,中国古代医学很早就萌生了职业伦理观。周朝时期,医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科,设有评价医学从业者的标准,《周礼·天官·医师》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2]独立的医学职业和医事制度已见端倪。在春秋战国时期,医学开始逐渐摆脱“巫医论”、“鬼神论”的羁绊,成为一种专门的经验知识和技艺,医学从业者逐渐开始成为社会上的一种职业阶层,促成了医学的职业化。在医学职业化发展进程中,随着医疗实践经验的逐渐丰富和对疾病病因学的不断认识,医学从业者面临的不仅仅是医一患、医一医之间的利害冲突,更需处理医学与自然界、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由此医学职业伦理开始产生。医学职业伦理是医学从业者在医疗实践过程中应当遵循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是指导医学从业者医疗思想和医疗行为的伦理原则。它从属于职业伦理,但又有别于其他职业伦理,因为它是与医学专业知识和技术紧密相连的,是公共性、职业性与技术性的统一。在医疗设备、医疗技术现代化进程中,医学职业化无疑是个先决条件,而医学职业伦理则在医学职业化进程中具有重大功能和作用,只有医学从业者具备正确价值取向的职业伦理观,医学才能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二、儒家伦理视域下重建医学职业伦理观之必要性和意义

纵观医学发展史,从传统的“医乃仁术”之美德到现代“技术至上”之思潮,医学职业伦理观正经历着巨大的转变。19世纪以前,从世界范围内来说,医学的进展一直都是很缓慢的,医学能够为人们健康所做的不多。因此,医学对病人所做的是照顾、开导和抚慰。虽然病人的健康没有得到很大改善,寿命也没有因此得到延长,但医学被视为仁术,医学从业者被看作很有人情味的人,医患关系自然和谐。而19世纪以后,基础医学领域中分子生物学的兴起,为医学从业者探索生命与疾病的奥秘开辟了新的途径,关于遗传、神经、免疫、内分泌等生命

现象的研究获得重大突破,抗生素、激素、化学药物、心脏外科、器官移植、人工器官等在临床医学领域广泛应用,让医学从业者相信医学无所不能,医患之间的人文关怀开始物化,医学越来越被看作一门技术科学,技术至上思想和唯科学主义在医学从业者的头脑中日益根深蒂固。在这种工具理性的映照下,医生们倾注其全部热情于疾病诊疗方法的寻找和应用,而逐渐忘记了医学诊疗活动中人的地位和价值,医学职业伦理观开始嬗变。另外,随着病人的权利与自主决定获得优先地位,医学从业者的德性则大打折扣。越来越多的医学从业者接受了医学的契约模式,即医学从业者不需要、也最好不要比明确写在或暗含在法律、规定、规则或契约之中的内容做得更多。这种模式扩大了病人的自主性,但却忽视了医学从业者的德性。它把医学从业者当作提供服务赚取利润的商人,剥夺了医学与仁的本质联系,使得医学不再是仁术。在今天不可阻挡的消费主义倾向面前,医疗活动已沦为一种商业,医患之间不再是同情与被同情的关系,而是赤裸裸的买与卖关系,医学似乎逐渐失去了本身的应有涵义,重建当代的医学职业伦理观成为时代的需要、医学职业发展的需要。

当前,在我国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医学从业者面临严峻的道德文化挑战,如何塑造一套适宜的职业伦理观,既能适应我国的经济条件,又能维护医学专业的道德完整性,成为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相接轨的重要问题。简单舶来西方道德标准的“拿来主义”做法显然并不适应我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无法对一些道德问题提供解释和辩护,也遭致越来越多的批评,因此应将视角转至重新开拓我国本土化道德文化资源,充分地、系统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重构适应自身文化特征并融入自身文化血脉的医学职业伦理观。儒家文化起源于孔子的“仁”学思想,后经历代儒学家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不仅推行仁政,还主张“长幼有序,惟道是从”的人际伦理,同时提倡“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个体修养观念及“孝悌和亲”的普世伦理观念。在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医学从业者的伦理道德准则大多来源于儒家伦理。医学在儒家思想里被认为是“生生之具”,“仁爱救人”是其最终目的,由此实现了“医儒同道”。正如《灵枢·师传》所指出的,掌握医术,即可“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东汉名医张仲景认为,儒家要实现“爱人知人”的理想,就应当明了医理、重视医

疗,这样方能“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宋金元以后,随着大量儒生进入医学领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医学传统——儒医,他们将医学视为实现其“仁爱”理想的重要手段。行医治病、施药救人就是施仁爱于他人,甚至行医活动也成为实现儒家“经世致用”人生理想的一种途径,即所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3,4]。儒学作为我国几千年传承的传统文化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医学理论的内容仍有争议,然而,儒家“仁”的教义塑造了中国医学职业伦理观的基调,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5]。儒家的道德信念目前仍然为中国的内地、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韩国甚至日本的道德思索提供丰富的文化背景,对医学职业伦理观的构建与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多方面的影响。当然,儒学思想是在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主要对封建社会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和论证,随着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以及阶级关系的转变,儒家伦理中的一些价值取向已不再具有普适性,儒家伦理需要批判性继承。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后,经中西古今的不断论证,当今儒家伦理的核心作用在于解决社会的时代性问题,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因此,在当代医学职业伦理观的重构中,儒家伦理中的优秀经典命题依然可以作为理论基础,在儒家伦理视域下重构医学职业伦理观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三、儒家伦理视域下重构医学职业伦理观的主要内容

(一) 树立“仁爱爱人”之本源观

在儒家伦理中,“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仁爱爱人”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儒家伦理中“仁爱”概念的内涵,历史地看,主要包含三层意涵,即“亲亲”、“仁明”、“爱物”。“亲亲”为“仁”之意涵,重“孝悌”,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明”为“仁”之意涵,在于“克己复礼”,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爱物”为“仁”之意涵,表现为“天仁合一”。儒家“仁爱”思想并不仅限于“爱亲”,而是从“爱亲”出发推及“爱人”,即“泛众爱”。如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由于“仁之法在爱人”,故行医治病、施药救人成为施“仁爱”于他人的一种最好手段。《灵枢·师传》云:“上以致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于是,行医治病成为实现“泛爱众”理想的一条重要途径,“仁爱救人”也自然成为医家的行业准则。

医学和医术,最能体现“仁”之思想,实现“仁”之宗旨,故自古有“医乃仁术”、“医者仁心”之论断,“仁爱爱人”是医学从业者必备的基本道德操守,是医学职业伦理中最核心的观念。《素问·金匱真言论》指出:“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传,是谓得道。”医学本是活人生命之术,不是诚心为人治病疗疾的人不要教他,不是忠于医学职业的人不要传授知识于他。“仁”最能体现医学人道主义思想和道德要求,是医学从业者长期一贯遵守医学人道主义要求所形成的医德品质。清代喻昌指出:“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在治病疗疾行为中,只有以仁爱之心对待伤残病弱者,才能最终实现以普遍的生命关爱为精神实质的医学之道。古人称医有“四道”,分别为“怜悯”、“济惠”、“周至”和“平等”,“四道”皆为“仁心”之表率,医家面对病人要有“怜悯”之心,关爱之情,同时予以“济惠”和“周至”,悉心照料,并始终践行病患之“平等”原则,不分尊卑贵贱。“怜悯者,每务仁慈;济惠者,常加爱护;周至者,运用无亏;平等者,勿论高下。如此推诚,稍入医学之道”^[6]。另外,医学关乎生命,系之生死,责任重大。孙思邈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黄帝内经》中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晋代名医杨泉也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因此,以“仁爱爱人”之心去敬畏生命、关爱生命是医之命脉。

(二) 坚持“见利思义”之价值观

孟子在孔子的“仁”学基础上,提出了“义”的命题,对天命观、人性论、道德修养等向度的儒家伦理进行了探讨,深化了孔子的伦理思想,特别表现在对外界事物的认识转化到对人自身本质的探讨。在对待道德与功利的关系问题上,儒家伦理始终坚持超功利主义观点,注重“以义制利”,重义而轻利,“见利思义”,“富贵不以义则不取,贫贱不以义则不去”。儒家思想里的“仁”与“义”是通理的,对“义”的践行实际上代表着对“仁”的体认。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对我国传统医学思想影响至深,古代医家将“义”的观念引入职业活动领域,行医疗疾中践行“义”的案例颇有一些文献记载,如在《格致余论》中朱丹溪记载了其师罗知悌的一则医案,为救治一个因念母而患病的僧人,非但未收诊费,而且还“与钞十锭作路费”,自主其回家探母^[7,8]。明代李木延在《医学入门·习医规格》中说:“治病既愈,亦医家分内事也。纵守清素,借此治生,亦不可过取重索,但当听其所

酬,如病家亦贫,一毫不取,尤间其仁且廉也。”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出:“凡大医治病,必当无欲无求,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既体现了医家关爱生命的一颗“仁者之心”,同时也是作为医生职业道德与操守的基本要求。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要求医者“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耳”^[9]。

在当今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对“利”的追逐愈演愈烈,医学似乎也为之动容,医学从业者面临各种各样经济利益的诱惑,出现了“红包”、大处方及药品回扣等现象,医学的公益性及伦理价值取向逐渐偏离“仁义”的轨道。儒家伦理对德性的理解及对仁义和利益的关系问题的理解为当代医学从业者以适当方式处理经济报酬提供了重要的洞见。儒家总是将行医视为一种践履儒家中心德性即“仁义”的方式。医学从业者在诊疗疾病时应怀有一颗“仁”心,以“义”处世,因而行医的本质目的是治病救人而非谋求个人经济利益,这一道德指向为医学专业实践提供了正确的框架。但是,儒家并非全盘否定对“利”的索取和要求,“医乃仁术”并不妨碍医学从业者从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中获利,相反,儒家认为适当报酬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只是对利益的追求应当置入对病人行善行仁的道德框架中。因为儒家伦理将利益内化于德性生活中,所以当医学从业者出色完成医疗保障这样的重要社会工作时,除了得到德性上的褒扬之外,也应该获得“利”的回报,这完全是恰当的。

(三)塑造“内省慎独”之医德观

儒家始终把自我反省与自我改造视为其伦理的重要方面,强调正心诚意和律己修身等德性。“天人合一”是儒学的根本观念之一。在儒家看来,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但不自觉的合一。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修身就是修德,就是养善,最终目标是至善、扬善。在儒家看来,德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只有通过修习德性,才能达到至善。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中庸》中指出:“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明德至善”是儒家学者的最高追求。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善”有四种内涵,一是“仁”,先秦孔孟以“仁”释“善”,认为“四行和谓之善”,又说“仁,

义礼所由生也,四行之所和也”;二是“礼”,荀子及汉代儒生以“礼”释“善”,注重养人之欲又有所克制;三是“阴阳之道”,宋明儒生视“阴阳之道”为善,强调阴阳和谐平衡;四是“节度”,明清儒家得“善”为“中”,突出人欲之各得。儒家在修养中强调防微杜渐,形成一种坚定的道德信念,做到在独自一人、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能自觉按照道德规范为人处世。因此,慎独不仅可以作为一种修身方法,而且也是一种道德境界。

儒家慎独学说可资借鉴之处在于它强调了道德自律,其本身不能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而是对道德原则、道德规律的尊重。儒家慎独思想对于医学从业者的职业道德修养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如清代喻昌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10]诊疗病中对于慎独精神的践行,医学从业者也应做到“四慎”:首先是慎隐,在个人独自承担诊疗活动时,要善于自我监督、自我控制,“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其次是慎欲,正确把握欲望的度,在个人欲望萌生时,要以坚强的道德信念和意志严格要求自己,凡是符合医德要求的就努力践行,凡是违背医德,有损医学尊严的,就坚决抵制;再者是慎省,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坚决维护患者的利益,“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冤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最后是慎微,医学从业者要谨小慎微,注意“小节”,防微杜渐。正如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所说:“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

(四)追求“博及医源”之医道观

在儒家文化中,“智”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品质之一,也是儒家五种重要德目之一,被视为“三达德”、“四德”及“五常”之一。“智”在古代作“知”,《说文解字》说:“知词也,从口从矢。”徐颢之《说文解字注》认为:“知,智慧及知识之引申,故古只作知。”其有聪明、智慧、知识之意。儒家将“智”列为“五常”之一,赋予了“智”以道德意义,使之成为儒家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成为仅次于仁的重要德目。孔子认为,“智”德表现为“知人”与实事求是的态度。“知之为之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将智、仁、勇三者统一起来,视为通行天下的美德。他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中庸》云:“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孟子倡言仁义、仁政,将仁、义、礼、智视为四德,以“是非之心”为智。汉代董仲舒将“仁、义、礼、智、信”视为儒家五种道德规范,成为儒

家人文修养的重要内容与美德。

受儒家伦理影响,古代医学从业者都十分重视“智”的修养,《黄帝内经》中就提出学医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这是为医必需的知识和技艺,这些知识和技艺的获得都有赖于“智”的品质。医学本是活人性命之术,医学从业者要有诚挚的敬业心。在人类医学史上,有许多医家忠诚于医学科学,坚持医学真理,修正错误。清代王清任敢于突破传统道德中反对尸体解剖的禁区,不避污秽,观察坟场弃尸、义冢中破腹漏脏之儿,完成了著名的《医林改错》。“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博及医源”,是否具有持久勤奋的精神很重要。《论语》中说:“人而无恒,不可作巫医。”这也是古代医家的一致看法。医学是关于治病救人的极其严肃的科学,要求医学从业者必须严肃谨慎地对待医学和医术。今天的医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

参考文献:

- [1]孙青平. 职业伦理与道德的新视角研究[J]. 河南社会科学,2010(6):208—210.
- [2]孙诒让. 周礼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87:254.
- [3]李海燕. 儒家伦理与传统医德[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34—38.
- [4]张大庆,程之范. 医乃仁术:中国医学职业伦理的基本原则[J]. 医学与哲学,1999(6):39—41.
- [5]范瑞平. 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69.
- [6]张仲景. 伤寒论[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24.
- [7]陈晓阳,曹永福. 医学伦理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28.
- [8]周一谋. 历代名医论医德[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44.
- [9]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12.
- [10]喻昌,著. 张晓明,校注. 医门法律[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37.

极其复杂、严密的科学体系,其研究对象是既具有自然属性的生物体,又具有社会属性和意识属性的复杂实体,所患疾病千差万别,发病原因、症状、体征、治疗方法多种多样,这就更要求医学从业者必须具有严谨的医术品质,精研医术,勤奋不倦。

随着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不断恶化,人类疾病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今医学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疾病,只有具备广阔的医学视野、丰富的科技文化知识,方能胜任工作,同时又要博中求专,对分工范围内的学科知识有较深入的了解。医学从业者的合理知识结构,应由以下三部分知识构成:一是医学基础知识,包括广博的医学知识以及一定程度的外语知识;二是临床实践知识,包括预防、诊断、治疗、预后等诸多方面的技能;三是医学相关分支学科知识,新时期需要的是“全科医生”,即通晓医学各相关分支学科知识,了解医学的发展趋势和走向。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Medical Professional Eth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ism

ZHOU Zhi-xin, et al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012, China)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profession, medical professional ethics is changing, with the emergence of technology-oriented ideas and scientism in medicine,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medical profession ethics has it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Confucianism is the theoretical guideline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medical profession ethics. The main content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medical profession ethics should include that, creating the origin concept of “kindness and sweetheart”, insisting the values ?? of “seeking justice”, shaping the ethics concept of “introspection and cautiousness”, and chasing the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of “grasping affluent medical knowledge”.

Key words: Confucianism; medical professional ethics; re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张家鹿]